

蟠虺

○ 刘醒龙 （连载 3）



“还是马先生说得对，你长着桃花眼，看什么都像看丝绸。等着吧，等柳琴活到九十岁时，她脸上肯定全是丝绸！”安静继续冲着话筒说，“在别人面前你俩是一对老顽固，你俩单独在一起，就成了一对老顽童。”

曾本之在电话这边笑，马跃之在电话那边笑。

他俩这样说话是有渊源的。当年马跃之结婚时，曾本之没料到自己的婚姻将会是比研究的青铜重器更难的难题，作为伴郎，他在婚礼上幽默地说，马跃之研究丝绸，就真的找了个丝绸般美丽的妻子，他要借马跃之的吉瑞祝福自己，既然是研究青铜重器的，将来就找一个浑身铜臭的女人做老婆。本是一句给婚礼助兴的玩笑话，没想到却一语成谶，当了半辈子光棍，最后真的和一个整天与钞票打交道的银行出纳做了夫妻。

笑话几句，马跃之才说正经事。他刚听说，宁波那边有个活动，可以去两个人，邀请方想让他俩去。他自然很想去，可以一路上与马跃之好好聊聊天。马跃之也清楚，曾本之这些年外出参加活动都是由郑雄作陪，他要曾本之破例一次，不要带郑雄，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机会。换了别人，这样说话肯定要弄出矛盾来，因为二人关系很好，再难听的话，只要是马跃之说的，曾本之就不会计较，反过来也一样。马跃之也不是真要言语伤人，一旦发现自己的幽默太冷了，就会想办法绕回来。果然，马跃之

接着就来了一个转折，说自己打电话来是想确认一下，宁波的活动，曾本之若去他就去，曾本之若是不去，他也就懒得去了。

曾本之端着那封用甲骨文写的信回家时，安静就对他说过这事，也是楚学院打电话来通知的。安静不等曾本之回来商量，就替他答应了。曾本之将这件事的过程连同安静的原话一并与马跃之说了。安静替他做主的理由是，男人活到这个年纪要多多外出走动，让外面的新鲜东西刺激一下神经，成天待在一个地方，死死地想一个问题，老年痴呆会来得更快。奇怪的是安静一向只要女婿郑雄陪同曾本之出差，这一次她竟然破例要曾本之拉上马跃之。

马跃之笑着说，自己现在太想患老年痴呆症，不想活得太明白，痴痴呆呆多好，说什么都可以，较真的话、难听的话、刺耳的话、装疯卖傻倚老卖老的话，哪怕站到水果湖的十字街头喊口号骂谁，也不会有人计较。

两个人在电话里将去宁波的事敲定后，马跃之还没有挂断电话的意思。曾本之觉得奇怪，如此拖泥带水并非马跃之的性格，这么拐弯弯一想，他便认定，马跃之还有什么话想说。于是，他将闲话打住，直截了当地问马跃之，是不是还有不方便的话要对自己说。

曾本之认真地回答：“郑雄下午是不是参加了省里的一个会议？”

曾本之一向对行政上的会议

不感兴趣，不管媒体如何连篇累牍地报道，官衔带长字的人唾沫横飞地宣讲，他都记不住，偏偏记住今天下午的会，是因为郑雄在家里说过，这是新省长上任后的第一个会。如果郑雄仅仅只是如此说一说，曾本之也不一定能够记住。郑雄说过之后，马上找出几本楚学研究的新书，说是看看有没有值得借鉴的新的研究成果。郑雄将那些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后，嫌它们只会炒剩饭。被郑雄瞧不起的这些书，其中就有马跃之的如何保护春秋墓葬中出土丝绸的专著。曾本之拿起马跃之的书提醒郑雄，这本专著学术水平相当高，不仅要读，还要好好读，否则就会在楚学界掉队落伍。郑雄没有说一定读，也没有说一定不读，只是说十本马跃之的书堆在一起，也比不上曾本之的一本书。

马跃之继续说：“下午的会，原本没有安排郑雄发言，因为时间充裕才让郑雄在最后一时刻说几分钟。哪想到他一开口就恭维新上任的省长是二十一世纪的楚庄王！”

马跃之将郑雄的话原原本本地说给曾本之听后，还要评论一通：“堂堂中原霸主统辖的范围有好几个省，一介省长，怎么能与‘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的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相比？就说现在，综合实力排名每况愈下，都要向二十名看齐了，对得起天时地利吗！退一步去想，就算省长能干，可以称为楚庄王，上面那位管他和领导他的省委书记又是什么呢？楚庄王虽然少年就登上大位，上面并没有太上皇，楚国历史中也从没有过太上皇。是因为父亲楚穆王死得太突然，楚庄王才无奈接管楚国权力。所以呀，郑雄这样乱用形容比喻，有僭越和礼坏之嫌。”

（未完待续）



（连载 81）

○ 陈彦

晚上，安北斗还架起大炮筒子观测过，天上是什么也看不见了，全是脏兮兮的光。而温家的夜晚，却灯火通明着。新麦子下来，都急着要吃新麦子馍、擀新麦子面呢，这货就忙得见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才歇磨熄灯。一早，夫妻俩又到地里收拾毁茬田去了。这小日子过的，那才叫男耕女织呢。

安北斗觉得真是犯贱，还惦记着这个货，是寻着上砧板挨剁哩。

端午节头一天，爹娘也催他麻利去看媳妇、孙女，他就上县了。

40 端午节

杨艳梅特别适应县城生活，觉得那简直就是换了人间。加上她爸又是一个副局长，在县城，也不算小官，一万多人口的地方，可以扳着指头数的也就那么几十个，并且还有那么多扛硬后台。自己调动，包括安妮上学，都没费吹灰之力。她所要做的事，就是将在镇上的穿戴打扮，全部换成“县城范儿”。县城人开口闭口别人都是“乡下来的”，曾让她很不自信过。自打她爸上任副局长，自己也正式调来，并彻底把浑身上下的衣帽鞋袜包括烫发样式革命一番后，走在人前就完全自信了。

最好的日子大概就是当“女光棍儿”。孩子利索了，上学接送有姥姥。想回家吃饭了，她一到家，她妈就能把饭端上桌。想出去玩了，哪怕唱歌跳舞到半夜，就说加班了事。晚上即使不回去，医院宿舍也能住，虽然是三人间，可平常真正在那里睡的至多一两人。关键是老公不在身边，她想跟谁吃饭、跳舞也没人管。偶尔也会感到寂寞，有点想安北斗。可一想起他那副窝囊相，抬孕妇、背死人、蹲坑放哨的，跟县城干部气质简直没法比，心里就会凉半截。尤其是她妈又爱嘟囔，她就更不愿解决目前的状况了。其实那天请客时，有人是问过她配偶情况的，结果让她妈一下给支吾开了。也不知咋的，她妈越来越见不得这个女婿，说好歹得让他在底下奋斗个正股级，要不然，嫌调来太给杨家丢人现眼。

安北斗来县城，提前也没跟杨艳梅打招呼，是想给她一个惊喜。尽管他也知道，她大概既惊不起来也喜不起来，可毕竟几个月没见了。他在酒店登记后，先洗了澡，才给她发信息。虽然有了手机，但还是很少打，她老不接。接了也甚冷淡。因此，手机也还是当传呼用了。过了许久，杨艳梅回道：“我五点半下班。”他就躺下睡了。一觉醒来才四点半。他也没再睡，就面对镜子，把头型捯饬了一番。大概是电吹风质量太差，还把最关键的一撮毛烫焦了，发出一股胶皮臭。他又躺下看了一阵电视，直到六点过几分，她才敲门进来。

杨艳梅现在完全是县城范儿了，尽管是自己老婆，见了面，他甚至都没有搂抱的勇气了。虽然此前，他已设想过多种相见法，都与激情四射、泰山压顶、势如破竹、鬼魂附体的量级相当。当人真的来到面前，那份高冷、淡漠，甚至身子人为一闪烁，他的激情和自信就顿失大半。那一身洁白到鞋袜甚至包包的装束，与他穿的酒店睡衣（尽管也是白色，但上面明显有烟头烧出了多个窟窿的破旧色）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那个他想象了一下午的久别胜新婚场面，不仅没有如期到来，而且还出现了让他生命激情顿感萎蔫的断崖式降级。

她用手摸了一下圈椅，看有没有灰尘。宾馆布草虽然破旧一些，卫生还是勉强能说得过去。她就跷起二郎腿坐下了。不得不承认县城与乡镇之间的生活差距。杨艳梅是比几个月前漂亮、年轻、性感了许多，甚至已逆回到生孩子以前的状态了。这还是自己的老婆吗？法律上肯定是，但心理距离，似乎有点像城里人会见乡下穷亲戚。

“你咋来也不提前说一声。”

他能听出，她话里似乎有埋怨的意思，就结结巴巴地说：“明天过端午……来看看你和安妮。”

她端庄直说：“我端午值班，不放假。今晚……还要上夜班呢。”

他就有点恼火甚至上头了：“安妮……我也不能看了吗？”

她也觉得有点理亏似的：“谁说你不能看了。你……不是老惦记着星星月亮吗？”说着，还故意盯了一眼她的大炮筒子。

“看星星月亮咋了，恋爱时，你不是也爱看吗？怀安妮时，你不是还在山上没人的地方，敞开肚皮，说让孩子也提前看看星空吗？现在咋这反感的。”

她一笑说：“看吧看吧，那是你的事。像你这样的人，满县城我还没听说一个。社会都到哪一步了，你真有闲心。”

“怎么你也是这观点，我耽误谁的啥事了？”

“没有没有，你谁也没耽误。你吃了没，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实在对不起，晚上……要值班，没时间陪你吃饭。家里……我知道你也不愿意去。”

（未完待续）



○ 徐则臣 （连载 73）

外祖父一辈子跑船，舅舅也在船上度过了一生中最初三十二年，他们只擅长与水打交道，对上海、对单位的人事部门、对革命委员会等响亮的事物满怀敬畏，他们不知道也不懂得与他们交涉、理论。当然理论毫无意义，革命压倒一切。他们沉默着抱紧骨灰盒，一人抱一只。遗物所剩无几，家里早被革命群众洗劫一空，偷的偷抢的抢，没收的没收，实在没用的东西点把火烧了，资本主义安插在人民内部的特务，每一个指纹都必须消灭干净。

回到船上，舅舅对外祖母说：“家里像个战场。”暴乱，清冷，任何象征生命和温度的东西都消失殆尽。两间房子的废墟。一张照片都没有留下。顾念章记得父亲长年写日记，但带回来的遗物里，连张纸头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人生，仿佛从没有来过这世上。跟顾念章有关的只剩一个被揪光了头发

的洋娃娃，父亲在哈同洋行做地产生意时，一个姓卢的同事从法国带给他的。

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的第一个寒假，顾念章去了上海。按照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上海地图找到捆绑父母的操场。操场还是操场，看不见陈年的血迹，雪都没有。上海的雪下得越来越少了。他还找到了他们家的大致位置，平房被置换成六层的民居。后来，顾念章又去上海，六层的民居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摩天大楼。顾教授仰头往楼尖子上看，觉得眼晕。这一次，他打听到了送他洋娃娃的卢叔叔的下落，登门拜访。卢叔叔下肢高位截瘫，“文革”时被打的。

“别为你爸妈难过，”卢叔叔拍着轮椅说，“提前走了倒清静。那才是刚刚开始。你知道接下来的十年，我受了多少罪？要是知道这辈子必须瘫，我宁愿开始时就瘫。所有折磨人的法子我全被试过了，快熬到头了，屁股挨了几根闷棍，我瘫了。有一天我做梦，在老哈同洋行遇到你爸爸。他还和年轻时一样年轻，而我老了，坐在轮椅上。他说，老卢，我愿意像你这样老。我说，兄弟，我倒希望你和你一样年轻。你知不知道，一年在这上面坐 365 天，比死还难受？你爸爸就不说话了，推着我在楼道里来回走。”卢叔叔对顾念章摆摆手，笑笑，“别劝我。一把年纪了什么道理我不懂？活着，是，能活下来已经烧高香了。我这不是好好地活着了吗？我活着，我不能忘记。”

现在你导师还保存着这唯一的纪念品。会议结束，你导师设了家宴邀请塞缪尔教授，饭后向塞缪尔教授出示了光头的洋娃娃。那

是个穿着咖啡色背带裤的男孩，几十年了眼睫毛还很长。此外还有五张有他父亲的照片：一张结婚照，两张三口人的全家福（一张是你导师周岁生日那天拍的；一张是他们把你导师送回外祖母家前拍的，那年你导师十岁），一张他在哈同洋行与同事的合影（左边第二个穿背带裤的小伙子就是卢叔叔），一张是 1958 年他在一次工商系统骨干培训会议上讲话的照片（戴黑框眼镜，穿中山装，面前是一个硕大的麦克风）。

“这就是我的父亲，”你导师把五张照片平摊在玻璃茶几上，“仅有的父亲。”他把塞缪尔教授带来的照片和五张照片里的父亲比较了一下，的确是一个人。“对我来说，父母永远是黑白的。”你导师说。他把照片做成只有他自己明白的排列组合，突然说，“塞缪尔教授——”

塞缪尔教授插话说：“请叫我雅各布。”

“好，雅各布，你看，”你导师说，“我刚发现，我父亲和犹太人有缘。他在哈同洋行做过事。据我所知，哈同本人就是犹太人，1873 年到上海后，从看门人做起，后来创办哈同洋行，成了地产大亨。我父亲后来送令堂去医院。现在，因为这件事，你带回了令尊拍的照片。历史又接续上了。”

“遗憾的是，你父亲和我父亲没法再见上一面。”

“见过了：你在，我在，照片也在。”

上海。耶路撒冷。北京。你见证了两位父亲六十八年后的再次相遇。

“耶路撒冷。”

你明确地听到这个声音是什

么时候？不过你应该先向塞缪尔教授解释一下那座歪斜的教堂和穿着解放鞋的耶稣，小时候你把他称作“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你和塞缪尔教授下了火车，到了上海。“长头发的外国瘦男人”，塞缪尔教授笑了。上海的早晨和艾格尼丝·塞缪尔夫人回忆中的一样，刚下过雨，车站广场上汪着一摊摊浅浅的雨水。塞缪尔教授深吸了一口上海的空气，闭上的眼睛半天才睁开，他说：“爸爸，妈妈，这就是上海。”

除了几分钟后就坍塌的房子，你从没见过比花街上的斜教堂更歪的建筑，比萨斜塔也歪不过它。比萨斜塔一度倾斜到 5.55 度，斜教堂的倾斜度是 5.68 度，如果双方的统计数字都准确科学的话。“你们为什么不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塞缪尔教授说，“这是我听过的建筑里最大的倾斜度。”哦，吉尼斯世界纪录。谁去申请？花街上的人忙的忙、闲的闲，忙的和闲的都没心思关心世界。那条运河边上的小街离世界很远。再说，现在重要的不是申请什么世界纪录，而是有人分出一点时间和精力稍加保护——据你所知，自秦奶奶在一个大雨之夜抱着十字架死在石板路上，再没人关心过这座教堂。四条街的人都叫它“斜教堂”，因为它的确是倾斜的，从教堂的基础开始往右歪。

教堂初建于何时，你查阅了《淮海市志》《淮海史志》《运河沿河地方志》《大运河史话》等九本涉及花街的资料，每本书里都言辞凿凿该教堂建于某年，但几本书里的时间相互又是矛盾的。比较集中的说法有三种。

（未完待续）